

宁夏江
著

晚清学人之诗研究



本书阐释了晚清学人之诗的民族诗学背景

时代特征

群体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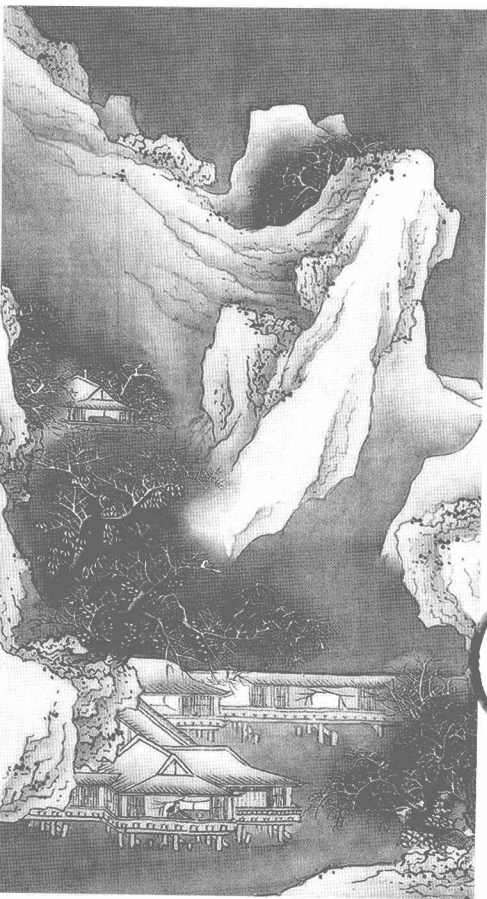
架构出其思想内容

学术价值及发展行变脉络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宁夏江
著



晚清学人之 研究



YZLI0890113866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学人之诗研究/宁夏江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81135 - 869 - 8

I. ①晚… II. ①宁…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963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16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3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清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中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有自己时代特色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时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影响，清诗研究是整个古典诗歌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不少具体的方面仍处在被否定或被遮蔽的状态之中。如何将清诗研究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至关重要的也许是视野和视角的开拓与转换。

清诗不仅集中国古典诗学之大成，也集学问化问题之大成。性情与学问的关系是清代诗学的重要主题，而对学问的强调几乎是在“宗唐桃宋”的纷争之上的。创作上诸种学问化因素无论在反对还是赞成的各派诗家笔下无所不在并漫汗于诗中，在诗学理论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对此，萧华荣的《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作了颇有见地的概括：“清代的诗论家，无论属于哪一个纷纭的流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视学问，强调性情要根柢于学问，即使主‘神韵’的王士禛、主‘格调’的沈德潜、主‘性灵’的袁枚也不例外。‘神韵’、‘格调’、‘性灵’诸说虽皆曾执过骚坛的牛耳，但绝不是清代诗学思想的主潮，倒是翁方纲的‘肌理’之论更能反映清代诗学思想的特征。”

如果将清代诗学置于古典诗学的学问化过程当中去考察，也许对清诗及清诗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将会有许多新的发现。首先，清诗的学问化状况本身就是个有价值的大课题，探讨其创作与理论上的存在和变化，于清诗研究未尝不具有拓展新层面、开辟新思考空间的意义。就诗学理论来看，“宗唐桃宋”基本上仍是当前探讨清代诗学思想的主轴，如果跳出这一局圈，转而就清人对性情与学问关系的建树专门梳理探讨，对于丰富古代诗学理论当不是无意义的劳作。

其次，这种探讨将会触及诗学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学问参与抒写性情的合理性和学理根据。清人普遍对钟嵘之说提出辩证，认为性情的表达必有学问的参与。如乔亿《剑溪说诗》说：“《诗品》曰：‘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愚谓情性有难以直抒者，非假事陈词则不可，顾所用何如耳。”方南堂《辍锻录》亦说：“作诗不能不用故实，眼前情事，有必须古事衬托而始出者。”钟嵘所处时代文化积累尚薄，“个体诗学”时代开始不久，作诗以“即目直寻”为多，其说自有道理。文化累积到清代，文人构成诗的创作主体，

学问就是他们的生活并浸泡于其中，其性情正在学问之中，并养就为审美情趣，远非即目直寻所能限制。这也触及中国诗学的特殊性，不是用西方诗学单纯的抒情性可以裁减的。

从学问化过程看清诗，还可以对旧问题产生新认识。比如，我们一向将清人的学问化归结为清代学风对诗学的影响，而从中国古典诗学学问化过程看，清诗的学问化尚有诗学发展自身的内在渊源，不单纯是清代学风的横向影响。再如对肌理派的评价，那种从“误把抄书当做诗”开始的否定延及至今天的论者，使对肌理派的研究与对清诗四大诗说的其他三派的研究比起来显得浮浅。如果透过“抄书”之讥的遮蔽，从学问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可开掘的空间正自不小，评价亦未必止于当下。

再次，承宋人“学者之诗”（张栻语，见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文人之诗”（刘克庄语，见刘辰翁《赵仲仁诗序》）的初步提法，清人对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又有“秀才之诗”、“儒者之诗”、“文人之诗”、“读书人之诗”等类似名目）的关系广泛关注，集合起来几乎形成系统的界定，增添了清诗又一重理论空间。而这实际上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对所流行的两大诗学状况的肯定，它还包含了类型、风格、倾向、诗法途径等多种因素。如果说诗人之诗表现性情，则学人之诗可否看成以学问化的方式表现学人的性情？这又是个饶有意味的学术话题。如果将学人之诗这一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诗学现象纳入清代诗学甚至是整个古典诗学的视野来衡量，则清代诗学及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可进入另一重学术界面了。

清代是学者参与诗歌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清代众多的学人之诗无疑是清诗学问化最集中的表现，古典诗歌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学人之诗在这个时期得以充分发展。晚清学人之诗是清代学人之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夏江的《晚清学人之诗研究》正是选择了清诗研究领域这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索。要完成这样的选题研究，困难是很大的。这个选题必须对分散的、零碎的和片断化的有关晚清乃至整个清代学人之诗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把有关学人之诗的学术思想观点从吉光片羽的状态中梳理而综合之，形成一个更高层面的可以拢聚的学术视点；阐释出晚清学人之诗的民族诗学背景、时代特征和群体特征；对晚清学人之诗中“诗”与“学”的关系进行阐述，描述出“诗”、“学”交融的形态、特征和手法，以及学术对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影响；构建出晚清学术史和诗歌史的横向联系，论述晚清学人之诗在学术的影响下衍变分流的轨迹。而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对晚清庞大的学者型诗人群体的界定，并从中遴选出各类代表人物；对清代学人浩如烟海的诗集、诗学著作和相关学术著作的选读、

整理。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夏江用这本著述作了较圆满的回答。他努力沟通了晚清学术史与诗歌史之间的联系，在对晚清学人的诗集和学术著作的仔细研读中，沿流溯源、寻根究底，努力展现晚清学人之诗发展衍变的轨迹及其艺术规律：晚清学人之诗是时代要求、学术思潮、文学风尚、诗人审美追求的结晶。研究的方法纵横交错，既有宏观的概述，又有具体生动的微观描述。在研究中不苟同也不树异，而是根据阅读典籍文献的资料、信息和数据来进行客观的梳理和独立判断。当然，作为青年学者，我们也许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对晚清学人之诗的内容与其学术思想联系的解读还缺乏深度，另外，对晚清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关系的辨析显得有点匆忙。

夏江自到暨南大学从我攻读硕士学位后一直倾力于清代诗歌研究，尤其注重晚清阶段。后攻读博士学位，学术视野扩大到整个清代诗歌，博士论文选择了难度很大的清诗学问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博士论文完成后，他又选择了较有研究心得的晚清学人之诗作为研究对象，并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09年立项。这本书便是他这三年研究的成果。现在，他的《晚清学人之诗研究》稿本就摆在我的桌前，遂为序。

魏中林

辛卯春于羊城

前 言

正如我业师魏中林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清代是学者参与诗歌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古典诗歌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学人之诗在这个时期得以充分发展。晚清学人之诗是清代学人之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学界开始关注晚清学人之诗，但对其研究还处于浮光掠影、未见深入的状态，受文苑和儒林分立的影响，在研究学人之诗主体时，学界要么只把他们当作诗人来研究，要么只把他们当作学人来研究，至今还没有发现把诗歌史和学术史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行研究的著述，使得这些“学者诗人”呈现出两副缺陷的脸孔，无法复合成一张清晰完整的面容。总之，晚清学人之诗乃至清代学人之诗这一领域，明显存在着学术研究盲区。

“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在清代前期就被杭世骏、方南堂等人明确提出^①，却没有成为清代诗学普遍关注的话题。直到晚清，张际亮、范罕等才在他们的诗论中作过简短的阐述，陈衍虽未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但在他的诗论中已频繁使用这一概念。

晚清学人之诗较早进入了胡先骕、钱仲联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视野中，他们把清代学人之诗与清诗研究紧密联系起来。

胡先骕赞扬了晚清学人之诗，认为沈曾植的学问“海涵地负，近世罕匹”，沈曾植的诗是有清一代最典型的学人之诗。胡先骕还有意识地学习晚清学人的诗歌创作，作为动植物学家，他把渊博的动植物学知识运用到诗歌之中，创作了如《春日杂诗》、《天香》、《声声慢》、《齐天乐》等学人诗词。钱仲联在《论同光体》、《沈曾植诗学蠡测》等文中认为：学人之诗本意就是学人写的诗歌，如晚清程恩泽、郑珍、莫友芝、沈曾植等学者的诗歌是学人之诗，而陈衍、陈三立等人尽管学问也很渊博，但他们终不是学人，而是文苑中的人物，其诗不能称作学人之诗。

继这些老一辈学者之后，不少学者以个案的方式论及晚清学人之诗。其中将学人之“诗”与“学”较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有邹进先的《龚自珍学佛对其思想与文学的影响》、郭瑞林的《魏源的时事诗刍论》、陆草的《论魏

^① 南宋理学家张栻曾提出过“学者之诗”（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其内涵相当于“学人之诗”。

源的禅诗及其净土信仰》、谭德兴的《论郑珍文学的经学化》、翔云的《曾国藩的振世诗文》、岑丽华的《从诗歌分析简朝亮的思想性格》、张永芳的《黄遵宪和“新世界诗”》、张仲甫的《黄遵宪的新意境和旧风格》、郭延礼的《论康有为的海外诗》、王柯平的《王国维诗学的创化之道》、张智慧的《论沈曾植诗歌中的佛学因素》；博士、硕士论文中有张明明的《林昌彝诗歌研究》、王有景的《郑珍诗歌研究》、丁佳音的《郭嵩焘诗歌的文化诗学研究》、张智慧的《沈曾植诗歌研究》、李瑞明的《沈曾植诗学的学术意识》，等等。上述研究者基本上阐释了晚清这些学者型诗人既有“学人”的一面，又有“诗人”的一面。

其他的论文虽有不少以晚清学人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却只注意了这些学者作为“诗人”的一面，不太注意他们“学人”的一面，没能较好地将其们的“诗”、“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目前还没有发现以晚清学人之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专题论文，但以比较宏观的眼光涉及晚清学人之诗的有吴淑细的《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贺国强的《近代宋诗派研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分析了晚清宋诗派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断融合的历史进程。魏泉的《论陈衍的“学人之诗”说》围绕陈衍与北京宣南的文人交游和他的《石遗室诗话》，阐述了陈衍“学人之诗”说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价值。

不是以晚清学人之诗作为研究对象但对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有启迪作用的有钱钟书的《谈艺录》，其中有专论“学人之诗”一则，他认为魏晋时期的诗歌“‘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学人之诗，作俑始此”；少陵、昌黎之诗非“学人之诗”，因为其学乃“诗人之学”。“学人之学”是精深之“学”，杜、韩之学虽也广博，但不具备“专深”、“精通”的特征，故他们的学问不是“学人之学”，只是“诗人之学”；他们的诗歌不是“学人之诗”，只是“诗人之诗”。而钱载等人的诗歌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裕。翁方纲大量以金石考据书法之学入诗，其诗是学人之诗的畸变，乃“学究”之诗。葛晓音的《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诗之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认为从乾嘉到晚清的士人，提倡学者之诗，崇尚生涩险奥的风格，韩诗才被奉为“圣境”。这种美学观念的变化有复杂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王辉斌的《杜甫诗歌：中国古代学者诗的范本——以其近体诗为研究的中心》认为唐代诗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才子型诗人，一为学者型诗人。前者凭借才气写诗，后者以功力进行创作。杜甫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坛上杰出的学者型诗人，其近体诗开中国文学史学者诗之先河，同时也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一部学者诗的范本，并揭示出中国古代学者型诗人及学者诗的一些规律。刘士林的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 20 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指出，当学人们进行诗歌创作时，一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诗歌意境的构造中，因而学人之诗可以看作是“学之别体”，是作为学人之学术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存在的；在《20 世纪中国学人之诗三题议》中，他指出“思维”与“直观”始终是学人进行诗歌创作时难以解决的逻辑矛盾，但并不意味着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它们在特殊历史境遇中以及在特殊个体身上可以实现和谐、统一。

大体言之，学界对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以下一些成果：

(1) 正面肯定了包括晚清学人之诗在内的清代学人之诗兴盛是清诗学问化最明显的体现，认识到晚清学人之诗是清代学人之诗的结穴和嗣响。

(2) 对晚清一些重要学者的诗集和诗学著作进行了整理和校注，为更好地研究清代学人之诗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参考资料。

(3) 开始以晚清特定的学人之诗作为切入口，置之于清诗学问化和清代学人之诗衍变的大背景下，对晚清学人以学问入诗的创作表现、重根柢学问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并试图阐释晚清学人之诗在清诗学问化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但既往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1) 对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分散的、零碎的和片断化的状态，迄今为止主要以分散自足的方式存在，缺乏一个更高层面的可以拢聚的视点，缺乏整体性的学术开掘和阐发，尚未形成从宏观层面整体观照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平台，以至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以晚清学人之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专著和专题论文。

(2) 晚清学人之诗，特别是引入金石考据等专门之学的学问诗，由于难懂而遭冷落，这些诗歌被人为地搁置起来，导致对晚清学人之诗的审美价值、学术价值及其地位影响的认识还很浅率。

(3) 对晚清学人与诗人、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儒林与诗苑相互融合而推衍着清代后期诗歌学问化历程的横向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人力未施的状态。

本书研究的目标是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紧密联系晚清学人的学术知识，从研读他们的诗集和诗学著述入手，试图探究晚清学人“学”与“诗”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他们如何以学问入诗，“学”与“诗”如何相互渗透，学术与艺术如何异质同构，“诗”如何成为他们“学之别体”等问题。归纳出晚清学人之诗的特征，大体架构出晚清学人之诗发展衍变的脉络，总结出晚清学人之诗的学术价值、审美价值及其地位影响。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 将晚清学人之诗纳入古典诗学特别是清代诗学研究的中心视野，从

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整体观照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平台。从古典诗歌学问化的表现、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历程、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原因三个方面来阐释晚清学人之诗的民族诗学背景；从繁盛学术影响下的清代诗坛、清诗学问化被强化的原因两个方面来阐释晚清学人之诗的时代特征；以专门之学（主要是朴学）入诗、诗歌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典故运用的经常化和偏僻化三个方面来阐释晚清学人之诗的群体特征。

（2）用“学者”和“诗人”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方法对晚清学者型诗人进行“量”与“类”的分析。从他们“诗”、“学”的影响和地位来看，晚清学人之诗可分为三类：①“诗”、“学”兼擅的学人之诗，如程恩泽、祁隽藻、郑珍、何绍基、莫友芝、沈曾植等人的诗歌；②不以诗名的学人之诗，如朱次琦、张穆、郭嵩焘、简朝亮、陈澧等人的诗歌；③以诗而名的学人之诗，如龚自珍、黄遵宪等人的诗歌。从学人之诗有“学之别体”和“情志心声”两种范式来看，晚清喜作“学之别体”之诗者主要集中于宗宋派学者诗人，如程恩泽、莫友芝、沈曾植等人的诗歌；喜作“情志心声”之诗的学人的诗学观和审美取向不同于宗宋诗派的学人，如朱次琦、缪荃孙、柯劭忞、简朝亮、王闿运等学人的诗歌都不喜直接以学问入诗。

（3）晚清学人之诗体现出清代学人之诗的衍变和分流，代表着清代学人之诗的延展、转型、新变和终结的四种趋向：

第一，晚清道、咸时期，宋诗派中程恩泽、祁隽藻、郑珍、何绍基、莫友芝以及同光体派中的沈曾植代表着清代学人之诗的嗣响，他们“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他们虽提出学问与性情合一，却在实际创作中首学问、次性情，大量以学入诗，诗歌成为他们阐发学问的工具，在语言形式上艰涩求新。尤其是清末沈曾植的诗歌造“学人之诗”之极，充分调动传统学问各门类的知识来扩张、开拓诗体的表现力，却无法挽救传统学人之诗的衰微之势。“晚清又复一度呈现的‘学人诗’，只能说是一种回光返照式的现象，无论就文化背景或诗体自身的生命历程看，均属病态景象。”（严迪昌语）

第二，自鸦片战争到清末，由于时事的变迁导致传统学术的新变，一部分学人开始以“实学”和“新学”（主要是西学）入诗，如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歌。他们“以经世致用为心，以变革一切为志，写新事，讲新知，用新典，创新体”（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这部分学人的诗歌代表了清代学人之诗的转型。

第三，受西学东渐的影响，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等人的诗歌

引入西方哲学宗教思想、政治学说、民主思想，西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著名学者或文学家以及历史文化掌故，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历法、地理、水利之学，西方的名胜古迹、名都大衢以及风土人情，西方的用语词汇等。这是“学人之诗”的新版（严迪昌语），代表着学人之诗的新变。

第四，新文化运动整体上采用了白话语系，废止了文言语系。胡适等人作为20世纪初新一代学者，提出“八不主义”，反对用事用典，主张“作诗如说话”，标志着清代传统学人之诗总体上的终结。

因而结论是晚清学人之诗的衍变是时代要求、学术思潮、文学风尚、诗人审美追求的结晶。

根据这样一个选题做研究，确实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笔者意图尽力写好这本书，但由于学识简陋，对典籍阅读不甚深入，对材料的占有尚难周全，误会或曲解在所难免，在观点与理论的运用上尚较粗糙，不够成熟。因此这本书如果能引起学界同行的兴趣和思考，并从中有所得益，我就释然了；如果能引来一些讨论，我就兴奋了；若能在这一领域内有更多本胜于它的著述诞生，那我就举起双手欢呼了。

宁夏江

2011年3月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晚清学人之诗的民族诗学背景：古典诗歌学问化	1
第一节 学问化在古典诗歌创作中的表现	2
第二节 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历程	8
第三节 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原因	22
第二章 晚清学人之诗的时代特征：清诗以学胜	33
第一节 繁盛学术影响下的清代诗坛	33
第二节 清诗学问化被强化的原因	44
第三章 晚清学人之诗的群体特征：论学人之诗	63
第四章 晚清学人之诗先行者足迹的追寻：清初至清中叶的学人之诗	82
第一节 概 述	82
第二节 肇启清代学人诗风的清初三大儒	86
第三节 清代前期至清代中叶学人之诗的衍变	96
第五章 晚清学人之诗鸟瞰	107
第六章 晚清传统学人之诗	115
第一节 道咸宋诗派学人之诗概述	116
第二节 首开道咸宋诗派学人诗风的程恩泽	120
第三节 传统学人之诗最后一朵奇葩：郑珍的诗歌	128
第四节 传统学人之诗的绝调：沈曾植的诗歌	142

2 晚清学人之诗研究

第七章 晚清学人的经世之诗	149
第一节 学之别体, 诗之新声: 论龚自珍的诗歌	150
第二节 “裨益经济, 关系运会”: 论魏源的经世之诗	157
第三节 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的策论诗	163
第四节 洋务派学人的经世思想诗	167
第八章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	180
第一节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概述	180
第二节 黄遵宪首辟境界的“新学”诗	191
第三节 康有为的“新声”诗	202
第四节 梁启超的欧西政治文化诗	209
第五节 王国维的欧西哲理诗	217
第九章 新一代学人的新诗运动	230
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51

第一章 晚清学人之诗的民族诗学背景： 古典诗歌学问化

中国古典诗歌从民间集体创作时代进入文人个体创作时代后，始终存在一个“学问化”过程，这一过程与诗歌的“性情化”处于一个共时性的平行状态。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莫不如此，主张“天然去雕琢”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天然之余，还须有学问潜在的润饰作用；重学问根柢的诗人也不会忘记抒情言志是诗歌的本质特征。单就古典诗歌“学问化”过程的本身而言，它又处于一个历时性的演进状态，即这一过程并不是某一时期某个流派所体现出来的片断性现象，而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基本趋向是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并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展开。

历代诗论家曾对以性情为中心的诗歌审美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到王国维提出“境界说”，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性情化问题的探讨已成熟到必须向海外引进新的理论体系才能继续下去，而诗歌的学问化问题在他们的诗学研究中只是鳞爪片语，零零碎碎，直到清中叶翁方纲的诗学，其立足点才“由以情感为中心转到以知识、义理为中心上来……使本来蕴涵在抒情诗学中的一种倾向真正独立出来有了一种理论系统，成为与抒情诗学相抗衡的诗学系统”^①。但对诗歌学问化的探讨远没有对诗歌性情化的研究那样完备和成熟——或许由于重道轻艺、重神轻形、重表现轻再现、重抒情轻体物是古典文艺的主导审美观，导致性情化问题占据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视野中心，学问化问题相对就形成了古典诗学研究的盲点或“灯下黑”。所以古典诗歌学问化问题的提出，其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中国古典诗歌原本存在的一个事实，更重要的是，它在以“诗言志”、“诗缘情”为主导的诗学背景中，将被视为诗学校节问题的“多识亦关诗教”^②作为诗学的重要内容来加以思考，增添了古典诗学存在的内涵，使与“性情化”潜隐而行的“学问化”审美层面豁然起来。

鉴于中国古典诗歌性情化问题的探讨已经烂熟，我们暂且搁置不议，而选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学问化作为研究的观照点，以便探讨晚清学人之诗是如何

①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5页。

② 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

在这一民族诗学问题的背景下展开的。

第一节 学问化在古典诗歌创作中的表现

简单地讲，所谓“学问化”是指将作诗与学问联系起来看待。学问主要由知识构成，而且侧重于“过去的”知识。知识不能涵盖学问，因为学问还包括对知识的运用，以知识为依托对事理、道理的思考探求等。但是中国古代士人所指的学问却偏重于指书本知识（哲学上所说的间接经验），如苏秦惭愧自己学问浅薄，“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①。贾谊有学问，“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书”^②。

有成就的古典诗人都会对诗歌与学问的关系深有体会。晋代诗人左思以他的切身体会说明诗文创辅以学问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③《三都赋》不仅言辞瑰丽典雅，而且包含着丰富的知识。清代诗人郑梁认为诗歌学问化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论者必欲其屏学识，离事理，将所言者何言而使吾志得明乎？纵使流连光景之余，别有神会，势不流为释氏之机锋不止，风雅林中仅此虚灵恍惚一派也？”他回顾中国诗坛上的名家大作，都摄入学问，“故余尝论三代以下之诗，其可称大家者，李、杜之后，惟韩、柳、欧、苏，而外此以诗名者，皆不得与。盖李、杜所以得称大家者……即以其诗为文，胸中学识，天下事理，悉于诗焉发之也。韩、柳、欧、苏之所以得称大家者……胸中学识，天下事理，未尝于诗焉勒之也”^④（《四大家诗钞序》）。近人吴宓也说诗人“非记诵精详、博学多闻，则其诗必空疏而乏材料，情志亦无所寄托，无由表现”^⑤。

徐世昌认为传统士人之学包括“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韵、礼乐、兵刑、农桑、布帛之要，下至射御、医药、术数、游艺、庶卉，满蒙西域外国

① 司马迁：《史记》卷69，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27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84，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629页。

③ 左思：《三都赋序》，《文选》卷4，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4页。

④ 郑梁：《寒村诗文集·见黄稿》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刊》集部256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39—240页。

⑤ 吴宓：《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4页。

之文”^①，近代学者王恩洋也认为他们的学问“自下技艺射御，上至天命性道”^②。传统士人的学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学术思想，属于形而上的文化；一是具体的学识技能，属于形而下的文化。古典诗歌的学问化在诗歌创作中相应地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上的层面；一是形而下的层面。

一、形而上的层面——以学术入诗

从诗歌的发展史来看，以主流思想文化入诗的现象如一根红线贯穿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魏晋之世，玄谈盛行，以《老》、《庄》、《易》为三玄，是为玄学时代，于是就出现了玄言诗。之后，佛教逐渐发展起来，至隋唐之时，佛学极为繁盛，是为佛学时代，于是诗坛大量出现以佛学入诗和以佛学喻诗的现象。宋、元、明三代，理学兴起，儒学杂糅佛学、道学，传统儒学有了新的阐释，是为理学时代，于是就出现了理学诗，邵雍、二程、庄昶等人的诗歌尽管写得很拙劣，但至少还是诗歌，他们用诗歌来阐发儒家学说，以理学入诗。到明清之际，许多学者批评理学的空疏附会，趋向于考证之学，是谓朴学时代，于是出现了以朴学入诗的学问诗。19世纪后期以来，西学开始影响中国，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想，是为西学东渐的时代，于是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新学诗。

以学术文化入诗，从具体的内容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 (1) 以经史之学入诗。
- (2) 以宗教之学入诗。主要包括以佛学、道教思想和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入诗，其中以佛教中的禅学入诗为最著。
- (3) 以哲学入诗，包括以先秦诸子百家思想、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心学入诗。
- (4) 以工学、农学、兵学、盐务、河防、海防等经世之学入诗。
- (5) 以小学、金石、音韵、校勘、辨伪、辑佚、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等朴学入诗。
- (6) 以音乐、书法、绘画、舞蹈、雕刻、建筑等艺术文化入诗。

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序》，中国书店1990年版。

② 王恩洋：《孔子学案叙论》，《孔子学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7) 以诗学入诗。^①

下面以对古典诗歌影响较大的经史、佛学为例说明引学术文化入诗的情况。

经史之学在传统之学中被看作是根基之学，是其他学术文化的基础，所以历代学人最看重的学问就是“经经纬史”之学。古典诗学自然也重视经史，钱谦益认为“学问”首先要“经之以经史”。^②黄宗羲说：“读经史百家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③陈衍说：“为学总须根柢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④张之洞也说：“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入词章者，其词章有用。”^⑤经史被认为是其他学问的源头，只有熟稔经史，打下扎实深厚的学问根基，才能使文章达到厚、高、妙、工的艺术境界。

儒家的典籍六经作为封建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诗歌当然与之息息相关。“夫文章者，原出五经”（《颜氏家训·文章》），诗（文）“根汲于六经”^⑥，“今古文章柄，持衡在六经”^⑦。精通经学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贯注着经学思想，化用或直接引用经学典籍中的语句，甚至经学中的学术风格也直接影响着诗歌的审美取向。从杜甫、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到

① 以诗学入诗主要表现为以诗论诗，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以诗论诗的先河。自杜甫这组论诗之诗后，后人纷纷在诗歌中引入诗学题材，不下七八百家（钱仲联《〈万首论诗绝句〉前言》），郭绍虞等人选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就是明证。他们用诗歌的形式或阐明自己的创作心得，如“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来皆成章”（韩驹《赠赵伯鱼》）。或表明对诗歌发展史的看法，如“建安后格多新丽，苏李前风尽已乖。欲识遥深清峻旨，稽公琴散阮公怀”（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之五）。或是对诗歌流派的评价，如“关陇英才未易量，刮磨何李竟丹黄。吴中往往饶才笔，也炷娄江一瓣香”（钱谦益《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九）。或是就不同诗人的人格诗品进行对比，如“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龚自珍《舟中读陶诗三首》其三）。或是对某首诗歌的激赏，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之十二）。或是对诗人名家的仰慕，如“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元好问《论诗》之五）。这些诗以诗歌形式阐明诗学领域的学问，是一种诗歌化的诗话，多本其诗学研究，出以韵语。

② 钱谦益：《周孝逸文稿序》，《有学集》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26页。

③ 黄宗羲：《南雷诗历题辞》，《黄梨洲文集》卷2，《传世藏书》别集12，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81页。

④ 陈衍：《陈石遗集》（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7页。

⑤ 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五编上卷，《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759页。

⑥ 翁方纲：《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复初斋文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⑦ 翁方纲：《送曹俪笙典湖北乡试三首》（其一），《复初斋诗集》卷52，《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